

红军长征中如何解决吃饭问题



“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”是行军作战的基本法则。然而,在当年中央红军长征的一年时间中,除了短期吃自带粮食外,大部分时间都是无后方作战,根本无法做到“粮草先行”,那么,红军长征中如何解决吃饭问题?

◀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,红军夜渡于都河的场景。新华社发

自带:湘江战役前的吃饭方式

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后期,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意识到中央苏区面临的危险,开始秘密做战略转移的准备,紧急进行物资筹备,其中就包括粮食、银元、药品、被服、武器弹药等的筹备。

1934年4月,中央苏区在群众中开展“每人节省三升米帮助红军”的运动,共筹集到7.5万担粮食;6月,向群众借谷10万担,没收和征收地主、富农的粮食约6.5万担;秋收之后,又向群众借谷60万担。至红军长征出发前,共筹集到粮食126.8万担(不同统计口径略有差异)。最终,红军带着92万担粮食踏上长征路。

在筹集粮食的同时,红军还开展了突击筹款运动。苏区财政部通过挖浮财、提前征收1934年土地税、紧急增加钨砂出口(主要是秘密出售给广东军阀陈济棠)以及向地主筹款等方式,最终实际筹款150余万银元。再加上中央苏区银行的积蓄,到红军长征时共有202万余银元。

这些粮食和银元由中央纵队和各军团分别携带,还有少部分银元分发给红军战士以备不时之需。

在湘江战役前一个多月时间里,红军基本上都吃自带的粮食。在湘江战役中,这些集中携带的粮食、银元损失巨大。

没收:主要针对土豪劣绅和反动军阀

中革军委专门成立了“没收征发委员会”,负责在长征中筹集粮款。1934年10月22日,中革军委总政治部颁发的《关于没收捐款暂行细则》规定,对顽固的大地主和反动分子,应当没收其全部家当。但也明确要求:不许乱打土豪,不许私打土豪,打土豪要归公。

当时打土豪有严格的规定和流程。曾任中央直属机关“红军纵队”司令部民运科长、干部休养连指导员的李坚真,是32位参加长征的中央红军女战士之一,也被称为“打土豪专家”。据她总结:每到一个新地方,就到高处去看村里谁家是高房大院,听谁家的狗叫得凶,然后再进村,看家里牲口

多不多,看灶台上锅大不大、油多不多,看农具是否齐全、家具摆设是否豪华。根据这些作出谁是地主土豪的判断,然后在他家大门上贴字条,最后再向群众核实。

对那些已闻风而逃的土豪,一是到家里搜浮财;二是动员群众检举,以保证打土豪准、快;三是估量土豪家产,贴罚款条子,要他们如期如数把款子送到指定地点。没收土豪财产后,红军即张贴布告,公布他们欺压、盘剥百姓的罪状。

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的活动前后达46天,共没收了268户土豪劣绅和军阀的屯粮。仅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家的盐行,就被没收价值几十万元的存盐,以及准备过年犒劳薛岳部队的价值5万银元的香烟和大批粮肉菜等;黔军师长柏辉章家被收缴银元2万元,粮食10余万斤。这些没收来的粮食钱物除红军留出自用部分,其余发给贫苦群众,先后共分给百姓大小牲畜1000多头、粮食90多万斤、银元2100元、盐巴500担、衣服5万多件。

征借:主要针对大商人、地主和富农

征借包含两种形式,第一种是无偿征发,主要针对大商人,有时带有一定的强迫性;第二种则是留下借据,说明以后有条件要还。

1935年1月,红军总政治部《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》中规定:极端审慎向商人捐款(即募捐),没有证实进行反革命活动来破坏(红军)军事行动的商店,不能没收。向较大商人募捐,须经军团以上政治机关决定。对中小商人一般不募。可以看出,红军向大商人征发是极其谨慎严格的。首先,确定其是大商人,而不是中小商贩;其次,要做摸底调查,看这个大商人有无跟地方军阀勾结,有无直接参与“围剿”红军或者顽固反共;三是要经过军团级以上政治机关同意,才可以去谈,态度要温和,数额要合理。

当年红军给藏族同胞留下的木制借据

红军《关于没收捐款暂行细则》中规定:对于小地主、富农等,可以要求他们捐献粮食、洋油和军用品。所有行动必须先张贴布告,做到安定人心并得到人民支持。当

然,红军在向富农借粮时,要充分考虑其经济实力,只征发多余粮食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,同时留下借条,说明将来可凭条索还。

在湖南汝城县档案局存有一张红军当年的借条:“今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一百零五担;生猪三头,重量五百零三斤;鸡一十二只,重量四十二斤。此据。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,具借人叶祖令,公原(元)一九三四年冬。”这张借条60多年后被人无意中发现,当地政府得知后即按现价折款,兑现了红军当年的承诺。

缴获:红军食物重要来源之一

长征途中与敌人作战缴获的战利品中,也经常有粮食、食物等。1935年1月10日,红军第一次攻占王家烈的老家桐梓后,在附近的秘密山洞里缴获了6万多银元、20余万斤粮食及大量食盐、布匹。24日,红军在贵州习水土城打垮黔军侯之担部,缴获和没收了部分粮食、财物和茅台酒,还分给穷苦群众一部分。4月,红军在云南曲靖境内截获了龙云送给薛岳的3大车物资,包括云南白药、宣威火腿等,并缴获该地为国民党军队准备的一大批军粮。

1935年5月上旬,红军巧渡金沙江期间,红三军团缴获敌人一卡车给养,除了大米、白面、饼干外,还有十几箱果酱罐头。5月下旬,红军抢渡大渡河前,在开罗场缴获川军刘文辉部筹办的粮站,获得粮食4000多袋。9月中旬,红军在向腊子口前进时,先头部队击溃敌人一个营,缴获了大批面粉、白糖等。炊事员用这些面粉做饭,战士们饱餐一顿后,体力充沛地去攻打腊子口,使部队顺利北上。到达哈达铺时,国民党守军已仓皇逃窜,丢下数座仓库,内存十几万斤大米、白面,数千斤食盐和一批棉衣、鞋帽等。这些战场缴获极大补充了红军的粮袋子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因为调动敌人而单独走了一段长征路的红九军团,在攻占云南会泽城后缴获了大量物资,等他们再次与红军主力会合时,一路积累下的银元达到了9万之多,这笔钱在懋功会师后,为采买粮草作出了很大贡献。

购买:对群众讲究买卖公平

购买粮食也是解决长征途中吃饭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。在向群众购买物资时红军想得非常周到,买东西前讲清政策、谈好价格并当面付钱,“买卖价钱要公平”“说话态度要和好”,不得强行购买,在向穷人购买时还要付高价以照顾穷人生活。当主人不在家而又确需购买时,或托邻居转交,

或把钱放在米柜、陶罐等既隐蔽又能使主人尽快发现的地方,或把钱款放在购买物品的原地,留下字条,写明数量和留下的银钱数目,并附有“深感歉意”“特表感谢”等留言。如四渡赤水期间,红一军团在古蔺因为两天没吃上饭,便吃了一名离家老乡的粮食,走时留了钱和纸条,说明原因,表示歉意。还特意交代后续部队:这户老乡家的粮食已经被我们吃了一些,剩下这些不要再动了,以防老乡回来买不到粮食,没饭吃。

1935年7月,红军进入川康藏区后,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,藏民多数逃离家园,红军想买粮食根本找不到人。为了筹集过草地的粮食,红军不得已收割了藏民成熟的青稞,并在地里插上木牌,上面写明收割原因、数量以及藏民看到后可以拿木牌到红军部队领银元。但后来也出现了因银元不够而改留欠条的情况,直到红军离开此地,有些欠条也没有兑换。毛泽东一直牵挂着这件事,新中国成立后,他特意指示川西和西康地区向藏民予以补偿。

1935年9月,红军进驻甘南哈达铺,发现这里物资丰富、物价便宜,便大量购买猪羊,为部队改善伙食。总政治部还发出号召“大家要食得好”,并给每名战士发一块银元,允许上街购物,但要按价付钱。这段时间,哈达铺因为上万红军到来而热闹起来,平时冷清的商店、饭店门庭若市、买卖兴隆,从未发生过红军和群众的交易纠纷。

采集:主要是过草地时挖野菜、采树叶

在长征中,吃饭最困难的是过草地的时候。因为在穿越松潘草地前没有筹集到足够的粮食,大部分人的干粮袋里只有少量炒青稞粉或麦粒,进入草地3天就断粮了,大家只能靠采集野菜、草根、树叶等果腹。

当时,水芹菜、马齿苋、茵茵菜、灰菜、苦菜、野韭菜等野菜成了官兵们的主要食物。有些人因误食有毒野菜而生病,甚至有的中毒身亡。为避免战士中毒,朱德总司令在请教了当地人后,便和大家一起挖回60多种野菜,分别摆在空地上,举办野菜展览,亲自教大家根据叶子形状、根茎的特点识别有毒和无毒的野菜。此后,误食毒野菜的情况大大减少。靠着各种野菜和少量青稞粉、盐巴,红军终于走出了茫茫草地。

除了野菜,战士们还采摘树叶、扒树皮,尤其是后续部队连野菜、草根、树叶都采不到,甚至出现了吃煮牛皮腰带、牛皮文件包、牛皮枪套的情况,还有一些战士因严重营养不良,牺牲在过草地途中。 阎丽 来源:《共产党员》